

再版序言

吴敬琏

《薛暮桥回忆录》是 1996 年 7 月出版的。当时,北京经济学界曾经为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虽然薛老已经离去,但他的精神遗产永存。天津人民出版社积极筹划,再版这本回忆录,我认为是很意义的。

我国经济学泰斗薛暮桥波澜壮阔的一生经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起于他在社会大学(包括“监狱大学”)中自学成才,终至成长为 30 年代中国左翼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第二个段落起于他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转行参加实际经济工作,而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为共和国经济工作的一位重要领导人。第三个段落包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整个改革年代,他由一位为市场化改革鼓与呼的经济学家,进而成为这一改革的一位重要设计师和推动者。

贯穿这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他始终秉持着极其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唯其有这种态度和精神,他不但能够在每一个阶段都尽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任务,而且能够从经验总结中提高,在理论上升华。这使他在生命的最后 30 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薛老作为左翼经济学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参加了左翼经济学家主流与其他理论派别之间关于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的论战,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路线。虽然从现在的观点看,这些年轻的左翼经济学家当时提出的论点和对不同观点的批判并不全都无可挑剔,但他们的工作对于整整一代人深入认识中国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后,薛老转做实际工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帮助他很快适应了这种角色转换,成长为一位娴熟的经济管理专家。这使他能够在共和国建立以后长期担任我国经济工作领导人的得力助手,参与了统一财经、平抑物价、“三大改造”和“大跃进”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战役。然而在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时期以后,他对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的怀疑,愈来愈演化为挥之不去的忧思。

这种惶惑和不知所从的状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转机。“五七干校”的生活单调乏味,然而,这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冷静思索、总结既往的机会。薛老跟我们讲述过他在干校一边劳动改造,一边认真思考“十七年”^① 经历的往事。这种思考的结果使年届七十的薛老大彻大悟,为思想和生活找到了新的方向。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时代,我和我的不少年轻同事一样,对于一言一行都力求“中规中矩”的薛老,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给我们的印象完全改变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宣布要向自己的“老弟”(孙治方)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说到做到。他思想活跃,不固执于自己的老经验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旧教条,而是与时俱进,唯真理是从。例如,他在70年代后期就不顾位高权重的顶头上司片面追求产值增长高速度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的情况,犯颜极谏,批评高指标、高速度的发展方针。他曾是中国“三大改造”经验的最重要的阐述人,然而当他认识到这种

^① 指1949年至1966年。

做法的偏颇，便勇敢地指出片面追求所有制的“纯而又纯”和“单一”乃是一种失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是正途。他曾在 60 年代初期担任过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是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物价工作方针的忠实执行者。但当他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在竞争中自由浮动价格体系时，便坚决主张“打破僵化的价格体系”，实现价格制度的改革。更加重要的是，他在 80 年代初期就提出了中国改革应当市场取向，以后虽然多次受到批评指责，却始终坚持，不改初衷。

在最后三十年的岁月中，薛老不仅在理论上明确坚定，而且由于对经济实务极为熟悉，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我国改革方案的具体设计和组织实施上的得力参谋和帮手。比如，80 年代中期的财政、银行、外贸体制改革方案就是薛老一手主持制定和帮助组织实施的。

经济思想史家海尔布鲁纳 (Robert Heilbroner) 把那些彪炳史册的经济学大师斯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等称作“入世的哲人” (Worldly Philosopher)，以彰显他们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老正是这样一位“入世的哲人”，他为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立下了不朽功勋。

薛老在 2005 年 7 月 22 日走完了他 101 年人生历程，离我们而去。消息传来，我正在上海授课。从 1959 年为准备全国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讨论会我和张卓元一起被分配做他的临时助手，到 1984 年 8 月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向薛暮桥总干事报到，开始在中心二十年的工作，再到他去世前十多天到北京医院对他作最后的告别，回首这四十六年的前尘往事，不禁感慨系之。

薛老虽然走了，但他的理论建树、精神风范和由他开头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新体制，都是人民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流传下去。

2005 年 7 月

目 录

一、献身革命事业

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 / 1

在工人运动中入党 / 6

“牢监大学” / 13

迎接新的斗争 / 21

二、在白区思想文化战线

开始经济研究生涯 / 25

到广西师专教书 / 30

在农村经济研究会和文救会的活动 / 37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 44

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的群体 / 58

将《中国农村》迁往内地 / 72

三、投笔从军

在新四军教导总队 / 80

撤离皖南到苏北 / 91

回顾皖南事变前后 / 96

在华中抗大五分校 / 99

在抗大华中总分校 / 103

四、在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实践

留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114

对敌货币斗争和工商管理/120

到华北财经办事处/128

在中财部和中财委/138

五、建国初期的经济工作

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149

对社会主义改造认识的逐步深化/157

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工作/172

对价值规律的研究/182

六、三年“大跃进”和五年调整国民经济

对“大跃进”的异议/190

参加政治经济学读书会/196

参与起草和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198

参加落实经济调整的几次重要会议/204

在全国物价委员会及参加“四清”运动/210

七、在十年内乱中

被批斗审查/220

在五七干校/225

曲折中得解放/231

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238

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246

出访美国、香港/256

九、1979年至1984年期间关于调整的建议和改革的探索(上)

关于调整的争议/262

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267

十、1979 年至 1984 年期间关于调整的建议和改革的探索(下)

筹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 / 278

为克服调整中的困难出谋划策 / 280

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探索 / 290

十一、理论上的突破和实践中的曲折

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 307

宏观失控和通货膨胀 / 312

反通货膨胀问题上的争议 / 319

从曲折中汲取教训 / 326

十二、在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中

关于改革目标的新的争论 / 331

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建议 / 336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总结 / 33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 343

附 录

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 349

我的主要著作目录 / 382

我九十年的历程 / 384

后 记 / 407

再版附文 / 409

“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写在父亲薛暮桥 100 岁寿辰之际——薛小和 / 409

想您,我们的爸爸! ——薛小和 / 418

一、献身革命事业

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

1904年(清朝光绪三十年)10月25日,我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礼社镇,父亲为我起名薛舆龄。无锡县位于中国江苏省南部,南濒太湖,风景秀丽,是著名的鱼米之乡。20世纪初的无锡,已有几家纱厂、面粉厂和丝厂,到了20年代工厂已近百家,成为苏南的经济中心,历来有“小上海”之称。像礼社这样一个小镇,也在1923年办了一个小发电厂,除照明外,还用于水利灌溉和轧米。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谓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但无锡在那个时候已有七分资本、三分封建之说。

薛姓是无锡西北乡大族。远在明代末年,薛姓的祖先是一个将军,因获罪贬谪到无锡礼社,大量购置田地,成为当地的大地主。他有五个儿子,二十五个孙子,形成一个地主集团。薛姓家族为五房,第五房的祖上用1350亩旱涝保收良田设立了一所“义庄”,供养后代中不能自己谋生的子孙。“义庄”规定,凡贫苦子孙,不分男女,年满16岁者,每年每人可分2石(300斤)米,16岁以下分一石米;婚丧大事均有资助,此外还补贴学费,救济孤儿寡妇。祖先设立“义庄”的目的,是希望后代能过稳定的生活,永传香火。但薛家的许多子孙由于有“义庄”

作为生活保障,便不但不愿务农,而且不愿出外做工、经商,待在家里打麻将,抽大烟,游手好闲,后来吃“义庄”的人越来越多。到我出生时,礼社薛家地主集团已趋于衰败。一些吃“义庄”的人开始靠借债典当度日。祖先为后代谋福利而设的“义庄”,最终加速了家族的没落,直到现在它的消极后果仍未完全消除。可见生存的权利要靠自己劳动来创造,坐吃山空是没有出路的。我的父亲爱面子,家境最困难时也并未吃“义庄”。当时我还处于少年时代,但发生在身边的这一严峻社会现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我注意社会经济问题的一个起始点。我在1932年写了一篇题为《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的文章,详尽地分析了礼社的经济状况和变迁。文中在分析薛姓家族没落时指出:“然自身已成腐木,决不足以支此将倾之巨厦。惟有坐待狂飙勃起,以结束其风烛残年而已。”^①

我的父亲薛魁标是一个知书明理的人,为人和善、厚道,从不打骂孩子,很少与人发生争执,在当地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开明士绅。他少年时家里有几十亩地,还开了一家烟店,加工、出售土烟丝。从家产看,我家在当地算是小地主兼小商人。薛魁标15岁时,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已经去世,由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当家,造了一所有三间四进的住宅,把田地卖了一大半,家庭经济地位逐渐衰落。当时全家有三房,薛魁标是长房,共生子女六人,三男三女;二房夫妻早丧,留下两个儿子;小房也有两个儿子,这四个都是我的堂兄。小叔平庸无能,在烟店当个普通的店员。这一个庞大的家庭,都靠我的父亲支撑,小辈长大要进中学、大学,开支很大。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我的父亲还想干一番事业。

薛姓祖先除办“义庄”外,还办了一所义塾(后称群智小学),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在我幼年时,由我父亲出钱,利用家中的大厅,办了一所“培本女塾”,为没有机会上学的女孩子提供读书机会。办女塾在20世纪初的中国乡村是不合封建传统观念之举,但我的父亲办这所女塾在礼社受到乡民的欢迎。无锡资本主义的开始发展和礼社地主集

^① 原载《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月出版。现收入《薛暮桥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团的破产，使封建思想随之削弱，开明与进步的思想相应来得早些。许多地主和乡民纷纷把女儿送来上学。“培本”为培养根本之意。女塾办起来后，聘请了一位教师，我的父亲和母亲也亲自讲课。我6岁时在这所学校读书。学校是女塾，因此同学都是姐姐，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成了全班的小弟弟。按规定，每个学生每学期要交三块钱学费。但大部分学生并没有交费，我的父亲也不好意思催要。虽然赔钱很多，父亲还是坚持办学。记得每天最后一课是母亲主持的，她要我们背书，我背了“天地日月，山水土木……”就可以回家了。到我上学一年后，这所深受欢迎的培本女塾终因家境日益艰难，办不下去了。

我的母亲周慎修（旧社会女人出嫁后，即不能再叫姑娘时的名字而随夫姓，那时母亲便叫薛周氏。新中国建立后，1953年参加普选投票，才以我家厅堂的匾为名，在选民证填上“周慎修”的名字），出身于地主家庭，少时也读书，到80岁还常看报。她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人，对子女充满爱心。她不但教自己孩子文化知识，也教我们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宁可自己吃亏，不能欺侮别人。”她不但养大了自己的六个孩子，还养大了早丧的叔婶留下来的两个堂兄，把他们培养到中学、大学毕业。此后，她又抚养第三代的子孙。她抚养过我的姐姐和哥哥的女儿。我的大女儿薛宛琴，出生两个月后就一直由她抚养，到14岁上海解放后，才回到我们身边。我的母亲在世上度过了九十六个春秋，只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过了十几年幸福生活，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惊吓凄凉地离开人世。

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次年元旦成立中华民国。当时以地主为中心的礼社乡民，陷入一片混乱。头脑保守的地主不敢剪辫子，怕清朝宣统皇帝复辟。我的父亲领着全家男孩把辫子剪掉，剪辫子不是赶时髦，而是赞成辛亥革命的表态。当时我仅7岁，在小小的心灵上，立下了从此不当清朝奴才的志向。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妄想称帝，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卖国条约。全国掀起了抗议活动。学校里也号召捐献救国贮金。我母亲每天给我一枚铜元，下午买点心吃，可以买一个烧饼。我把这枚铜元留到次日，早晨上学时就投入贮金筒内，对国家尽一点微薄力量。后来听说这些贮金都被经手人贪污了，我大哭一场。当



母亲

一位热心教育的人,学校的教学质量是相当高的。

1918年我14岁,在东林小学毕业,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和饭费,那些学业优秀、家境贫寒的学生都去报考师范。所以考师范比考中学难得多,约十名考生录取一人。我在东林小学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第三师范的校长就是当过东林小学校长的顾述之,对东林小学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考师范并不感到紧张。

顾述之是蔡元培式的教育家。蔡元培的学问品德是众所敬仰的,他办学的方针是博收众长,让学生自己选择。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当校长时聘请的教授中,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有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之,还有崇尚儒学的梁漱溟。我后来的治学引路人陈翰笙也是该校当时的青年教授。教员中有精通古书的汉学专家,也有赞成看小说、写白话文(当时这是禁区)的现代文人。顾述之崇尚儒学,第三师范的对门是孔庙,所以他把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所说“弘毅”两字作为校训(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 泰伯》),用任重道远来勉励我们。顾校长像东林党人一样讲气节。后来他的儿子因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而被捕,他到省政府去求保。省政府说只要自首就可释放,他问怎样自首,答要招供同党。顾校长沉下脸说,

时,还没有真正救国的革命政党,所谓“救国贮金”,大抵不过是投机政客借此骗钱的把戏。

培本女塾停办后,我就读群智小学。不久群智小学亦停办,我只得赴县城就读东林小学,住在外祖母家。东林书院曾是明末东林党人讲学的地方,东林党人很讲气节,这对学生也有一定影响。东林小学原校长顾述之是一位有正义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知名人士,社会上称他是“江苏蔡元培”。我在东林小学上学时,校长已由辛柏生继任,也是

这事我不能替他作主。接着叫儿子自己决定，他对儿子说：“我不劝你自首。”不久，他的儿子宁死不屈，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各地纷纷罢课、罢工、罢市。第三师范预科和一、二、三年级学生主张罢课，四年级多数学生因怕耽误毕业考试，反对罢课。学生会长是四年级学生，开会时不让表决，双方争执不下。顾校长参加无锡各界会议后，知道商会决定罢工、罢市，其他中等学校有的已经决定罢课。他下午回校后就召集学生宣布罢课，次日出去游行演讲，叫年龄小的学生不要参加。我是全校最小的学生，但决意去参加游行，向市民进行救国演讲，反对军阀政府签署和缔结丧权辱国条约。暑假期间，我回礼社利用群智小学的油印工具，与几个同学创办一张油印小报，每期发表几篇批评列强、军阀，宣传爱国救国的文章，提倡抵制日货等。每份报纸售价一个铜元，销路很好。得了钱，再买纸出下一期。大约每星期一期，办了一个暑假。那时我还未满十五岁。

“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20年，我从学校的书柜中发现一本不知是谁放进来的宣传社会主义的几千字的小册子，阅读后，虽然不真懂，但觉得新鲜，激起我的救国热情。我开始感到自己不再是个孩子，已经走进了喧闹的社会大门，萌发了改变现状的朦胧念头。

19世纪中叶开始，帝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国，冲击了民族工业和手工工业。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给农村经济带来巨大灾难。我在师范读书时，由于纸烟占领了市场，家中卖土烟的生意越来越难以维持，从赚钱变为亏本出售。我的父亲要抚养三房十个孩子，最大的（二叔的长子）读到大学结业，开支很大，变卖田地家产后，还负债累累，家境艰难。烟店的生意是每年秋季到烟业行去赊买烟叶，待来年春季付款。到债主将要来索款时，我家已经无钱还债了。我父亲是读书人，很爱面子，怕债主追债无脸见人，就在他五十岁生日前几天，估计债主快上门时悬梁自尽了。次日我在学校接到父亲去世要我立即回家的口信。父亲去世的噩耗有如晴天霹雳，这一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这一年我刚满十五周岁。



母亲与兄弟姐妹

父亲死后约半年，母亲神情忧郁地告诉我，家里生活已无法维持，要我辍学出外谋生。她已请姨丈的弟弟——杭州车站站长嵇竹贤介绍我到杭州去报考铁路的练习生。母亲知道她的这个儿子学业出众，继续学习，将来可有作为，但又不得不将实情相告，让我辍学。丧失读书机会使我内心十分痛苦，但为了不使母亲为难，我只能向学校说明。后以薛雨林的名字到杭州投考。这时我的大哥鹤龄在杭州一家纸行当学徒，可以互相照应。从此，我走出了礼社这个衰落的江南小镇，并离开无锡，时年十六岁。

在工人运动中入党

1920年的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沪杭铁路归英国人管理，招工相当严格。当时铁路行车规程和电讯联络都用英文，主考人是杭州段长，要我用英文写一篇题为“Communication of China”（中国的交通）的短文。由于我在东林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即学了英文，第三师范又把英

文作为一门重要课程,所以我的英文成绩相当好,顺利地考取了,当上了铁路练习生。从此结束了第三师范的学业。这段师范学业,便是我的最高学历。

在做铁路练习生期间,同事们认为我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能力强,肯实干,而且持之以恒。杭州段长根据考试结果,让我在杭州车站学习会计。杭州是个大站,客货运量很大,会计要把每班车所售各地车票的收入详细记录下来,到深夜结清全部账目,次日连款项全部上报。每月上旬还要做全月的月报表。我依靠自己比较好的数学基础,经过刻苦钻研,只用三个月时间就学完了原定六个月学完的知识,掌握了烦琐的会计业务。与此同时,我还学会了收发电报等。车站的老会计已经工作十几年了,也没有培养出一个人能代替他,多年没有休假。他对我这个小伙子掌握会计的进度又惊又喜,向上级请假一个月,放心地将会计工作交给我来做。铁路原来规定练习生要学六个月,由于老会计急于休假,上级破例批准,我三个月就被录取为正式职工了。做会计工作后,为了熟悉整个车站的业务,我一有时间就到售票房和行李房去学习,细心观察各个细节,逐渐对车站的各项业务都心中有数了。铁路局车务处长和段长对这个刚来三个多月的青年人比较满意,我几次得到越级提拔。

在代理会计期间,我每天上午10点钟去上班,直到深夜12点才下班。我利用休息时间读小说,偷偷地读学校里当时列为禁书的《红楼梦》。每天半夜里结账完毕以后,还读一两个小时。有一个寒冷的深夜,窗外雨声淅沥,室内灯光昏暗,我读到林黛玉葬花诗的“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两句,触景生情,不禁伤心落泪。这一情景使我记忆很深。现在已九十多岁,仍能背诵《红楼梦》中的一些诗句。我在工作、读书之余,产生了创作的欲望,曾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发表在无锡的《锡报》上。

我在杭州站做了三个多月会计,铁路局车务处长见我具有独立工作能力,便派我到连接上海南、北两站的新龙华站任站长助理,继而任

替班站长^①。那时铁路站长大都是由 25 岁以上的人做,我在 20 岁就升任站长,成为铁路局站长中最年轻的一个。

新龙华虽然是个小站,但上海南、北两站开来的火车在新龙华连接后开往杭州,杭州来车也在此处分开驶往南、北两站,指挥工作相当繁重,是上海的西大门。那几年连年军阀混战,铁路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在新龙华任站长时,苏浙两省军阀曾在此地激战^②。车站是浙军的进攻目标,几百颗子弹穿破车站的玻璃窗。江苏军败退时,浙军持步枪刺刀闯入站长的办公室。战后每天几十列军车频繁来往,我带领车站人员在站台上调度过往车辆,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军队官兵对我们十分粗暴,每交代一项任务时,总要说:“站长,你的脑袋要不要?”继而再说要做什么。连浙军一位旅长都看不过去,有时出来斥责无礼的士兵。我们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带着满肚子的愤恨干下去。

1926 年秋,北伐军击败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于 10 月 10 日攻占武昌。与此同时,北伐军的东路军在 10 月间向据守在武昌、九江一线的北洋军阀孙传芳大举进攻。孙传芳原来是直系军阀(1926 年兵败后投靠奉系),1925 年 11 月在南京成立他所占据的浙、闽、苏、皖、赣的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他与吴佩孚各自拥有约二十万兵力,是直接向北伐军作战的两股主要的军阀势力。10 月 16 日,由孙传芳任命的浙江省长夏超倒戈,宣布浙江“独立”,正式接受北伐军委任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职务。孙传芳一面派人同蒋介石谈判“和平”条件,一面调兵遣将迅速向夏超进行反击。浙江另一支地方军阀周凤岐率部观望,以求自保。夏超的警备队不堪一击,孙军于 10 月 23 日重占杭州。

夏超反孙时,原在笕桥的小股孙传芳驻军逃跑,要把他们抢来的四个车厢财物运走,站长因车运繁忙没有照办。夏超失败后,驻军回到笕桥,痛打站长。站长逃跑不归,无人敢去接替。铁路段长在这危急之时委任我为笕桥站长。我到任后,发现在新龙华站认识的那位旅

① 替班站长是在站长休假时去做站长。那时站长每月休息三天,也可以两个月或三个月合并休假。我在沪杭铁路的许多车站都做过替班站长。

② 1924 年 9 月,占据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与占据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而爆发军阀混战,史称江浙战争。10 月,占据福建的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率部进入浙江,卢永祥兵败。

长正巧在笕桥驻防。我请旅长派一名护兵驻站协助,每遇士兵或下级军官蛮不讲理时护兵就以旅长的名义出来阻止。因此我在笕桥站工作期间,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履行了站长的职责。另外,我在任替班站长期间,几乎跑遍上海到杭州所有的车站,结识了很多铁路职工。这为我在以后参加和领导铁路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1926年秋,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派共产党员陈志一同志为代表来到杭州,他是杭州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当时铁路工人是工人运动的主要力量,陈志一同志整日奔波于铁路系统,秘密开展工作。1926年底,陈志一同志来到笕桥,介绍我参加铁路工会的组织工作,动员铁路工人支持逼近杭州的北伐军。我几年来在铁路目睹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早就期待国民革命军的到来。我当即接受了分配我的工作。从此,我便利用自己在铁路部门的身份,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路工人运动。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进占杭州,我闻讯立即赶到杭州车站。这时铁路工人的游行队伍迎面走来。走在前面的陈志一同志立即让我加入游行队伍,到沪杭甬铁路杭州办事处大院集合,召开铁路工人大会,选举工会筹备委员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伐军东路军司令部政治主任胡公冕同志。经陈志一同志介绍,我代表车务处工人被选为筹备委员。当时铁路工会的领导人,有1923年就在杭州建立党小组、此后又长期在沪杭甬铁路闸口机械厂秘密领导工运的沈干城同志等。大会由陈志一和胡公冕同志主持。

我在积极组织工会活动的同时,阅读了当时作为禁书的《三民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并向陈志一同志借阅上海大学油印的苏联布格达诺夫著的《政治经济学》^①等书。这些书籍强烈地吸引了我,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更引起我的兴趣。但由于刚刚开始接触这一领域,我还不能完全看懂。

1927年2月下旬,陈志一同志约我来到宁静的西子湖畔,向我提出了出乎意料的问题:“我想介绍你参加国民党,你愿意吗?”我断然答

^① 今译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道：“要参加就参加共产党。”陈紧接着又问：“共产党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我略略思索了一下说：“国民党好像是火车开到嘉兴，就不走了，而共产党一直到上海，国民党革命不彻底，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彻底。”陈若有所思地说：“你有没有共产党朋友？能介绍我参加吗？”我摇了摇头。他拉住我的手说：“让我们一起找共产党吧。你找到介绍我，我找到介绍你。”次日，陈志一同志拿来一份国民党入党申请书，其中有对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意见，说先填了这表再找共产党。我正确地回答了表中为什么要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问题。这时，我已经意识到陈志一同志可能是共产党员，填表是来考察我的。

1927年3月1日，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上午，陈志一同志带着我来到共产党杭州地委，见到了地委书记庄文恭、宣传部长华林和年仅16岁的组织部长徐雪寒。庄文恭同志告诉我，经地委讨论，已同意我参加共产党。这使我多么高兴呀！此后我常说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政治生命是从这里开始的。

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成立是经过激烈斗争的。工会的大本营是闸口机械厂，这是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1925年已由共产党员沈干城同志领导成立了铁路工人俱乐部，秘密发展党的组织。1927年2月7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在汉口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钟鼎祥同志作为沪杭甬铁路工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工程处、车务处的职工比较分散，易受黄色工会影响。当时总工程师郭伯良在闸口召集工程处工人准备成立工程处工会，不受总工会领导。总工会几个领导同志闻讯后赶到闸口去找工程处工人谈话，告诉他们郭伯良反对总工会的阴谋。到开会时，沈干城登台讲话，工人齐呼打倒郭伯良的口号，把郭伯良吓跑了。此后，松江车站站长李申华等在松江车站召开成立车务处工会的会议。我以笕桥站长的名义登台讲话，揭露他们破坏总工会的阴谋。李申华等便偷偷溜走了。

1927年3月28日，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在国民党省党部（当时浙江国民党省党部的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宣中华同志，有国民党左派沈钧儒先生等参加）开成立大会，选出新的领导班子。由于工会声势浩大，由蒋介石委派的新任沪宁、沪杭甬两路局长孙鹤皋闻讯也不得不赶来参

加,表示祝贺。开会时,传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喜讯,全场一片欢腾,齐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歌曲,连唱多遍,唱到声泪俱下。会上,由陈志一同志作了政治报告,选出有十七人参加的执行委员会,并提出二十三条改善工人待遇的要求。局长表示原则同意,等待具体研究。

3月29日,执行委员会开会,选举沈干城为委员长,我为组织部长,丁继曾(被捕后叛变)为宣传部长,再加钟鼎祥等六人为常务委员。正开会时,局长派人前来通知,当晚局长乘专车去上海,请工会派一委员随同去沪。工会当场决定派我代表工会随局长去上海。由于沪宁、沪杭甬两路管理局在上海北站,南站归沪杭甬铁路局管理,所以我先到南站。这时机务处、车务处都在分别筹组工会,经我劝说合并了。我一到上海就听说上海总工会在闸北湖州会馆,所以不顾疲劳只身穿过租界。途经北站时,看到起义中死难的烈士二三十人的尸体在车站周围尚未掩埋。我满腔悲愤,默默地向他们致敬,并加快脚步赶到湖州会馆。大门内站满系佩红臂章、手持步枪的纠察队员,他们都在学习如何使用新缴获的枪械。我拿出陈志一同志写给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的介绍信。接待我的同志说汪出去了,今天不一定来,叫我留下地址,约定明天派人到南站去看我。

第二天,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王荷波亲自到南站来看望我,领着我到上海总工会去会见汪寿华。汪已预约了沪宁铁路总工会的委员长孙泽川同志,介绍他同我见面,并要我跟孙到沪宁铁路总工会去同他们面谈此后工作联系等问题。总工会把我的名字记下来了,通知我参加了几次重要会议。一次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大会,在会上我见到了上海市民代表提名的共产党代表罗亦农同志,他被选任市政府委员时会场热烈鼓掌,盛况空前。那时在杭州,共产党还是半公开的。另一次是传达蒋介石可能叛变的秘密会议,主持人是赵世炎同志。会上说:假如蒋介石封闭工会,你们不用等工会命令,自动罢工,自动出来游行。这时杭州的国民党右派已经纠集一批流氓,组织黄色工会,砸了杭州总工会办公室。总工会宣布全市罢工,沪杭铁路工人也奉命罢工一天。由于沈干城同志已来上海,我就回杭州向闸口机厂党员传达我党关于对蒋介石准备叛变问题的通知。果然,在